

我第一次去张先生家还是六、七年前的事,那时到晚报主持工作不久,拜访前辈,聆听教诲,也算报社一个好传统吧。记得年轻时读新民晚报,就喜爱张先生的“月下小品”,署名“一张”的专栏,每篇三百字,篇篇都那样博学、隽永、深刻。今虽有微博文体,但像这样的文字功力仍然少见。与张先生交往,多少也带有晚辈的仰慕之心。

张先生个子不高,微胖,头发花白,但镜片底下两眼依然有神,每当说起一些社会的不公、不雅之事,他总会半带忧愤半带幽默地评点几句,这种神态与他自称写了几十年的“豆腐干”文章一脉相承,和这本回忆录的风格也大抵相近:他是一位怀有理想、追求正义,又不乏有点恃才倨傲的知识分子,其心至善,总是被远处的光明吸引着,可其路不平,似乎总在坎坷的通道里苦苦寻觅。

张先生生于1922年,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百多年中我们家出了二十五个秀才,都是只读书,不做官,远离政治。”可张先生中学刚毕业就与政治沾上了边,他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说:“很难说自己是生逢盛世还是生不逢辰,因为我出生时正是帝国主

义列强入侵中国,封建军阀四方割据,连年混战的年代。这时候已是公历1921、1922年之间腊后春节的日子……风雨如晦之际,地平线上出现一通亮色,这就是五四运动和其后2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腊后春前,乍暖还寒,不懈笔耕,期待花开。张先生对自己所处时代有形

“一张”知史

读张林岚先生九十年回忆录《故事新闻》

陈保平

象的描述,或许也隐喻了他个人境遇的写照。他在这个外围组织一呆就近五十年,直到“四人帮”粉碎,新民晚报复刊,极“左”思潮得到了一定程度清算,他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里既有他个人对信仰的矢志不渝,也反映了时代革故鼎新的进步。或许因为作者是报人,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接触了许多重要人物,他的个人沉浮总是与时代的变迁融汇一体,其间,个人的感受和诸多细节可以让今人更加真实地了解过去。比如,他写到了“大跃进”时的报纸,标题越来越大,套红、充满豪言壮语,登峰造极之间,“我们报纸和全国大小报纸都发表过亩产稻谷一万至六万的新闻,记者当场拍了照片,确实有个小姑娘坐在密集的稻床上,人与稻居然都没有倒



初遇画家沈向然时就知道他是个手脚勤快又肯动脑的人。沈向然是沪上擅画民居建筑的知名画家,同时他又有扎实的写生功底。这些年在画中国民居绘画的探索研究中,他不辞辛劳,走遍大江南南北,徽派民居,湘西吊脚楼,客家土楼,西部藏居,开平碉楼等等,在实地中他不厌其烦,以写生的手法绘就了大量作品,通过绘画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极

大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民居建筑,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的大量水墨作品,一经展出就引来众多好评。两年前的世博会,通过世界各地的特色建筑启迪人们城市建设时,更富有创意,更有活力。而作为上海的画家,沈向然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能用自己的画笔将这一盛况用艺术语言记录下来是件意义深远的事情。他用心这样做了,世博会期间,他前后三十余次深入现场写生,终于将世博场馆悉数画了出来,总计128幅,全景再现了这届世博会的盛况。

沈向然每次进入世博会园区内总是先找准位子便急切地开始写生,无论场内多么热闹都无法干扰他用心作画。七八月份正是上海最为炎热的季节,他常常在烈日下劳作。他曾给我说起其中两次因不堪烈日烤炙而中暑,但只要回过神来仍会拼命地画,有的是抓住时间进度。听了他的话,我极为感动,在物质享受大行其道的今天,肯如此吃苦的画家也已经不多了。去年他的部分世博作品在上海一经陈列就赢得广泛赞誉。而深圳相关人士在得知他这批世博写生作品后,十分关注,盛邀他参加深圳2011年文化博览会。在深圳展出期间更是引起轰动,观众盛赞这些画作使他们重温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盛况。这次,在上海举办了部分内容后又又在上海举办笔歌墨舞绘世博会——沈向然写生上海巡回画展,在各方的配合支持下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沈向然的刻苦勤奋早已在画界中为人熟知。难怪在一次画展中听到著名画家张桂铭先生提起沈向然时用赞许的口气说:“沈向然是脚勤、手勤、脑也勤……”衷心希望沈向然在艺术绘画的道路上越走越高,越走越远。

黄宗羲在清兵入关后积极抗清,失败后隐居余姚,屡拒清廷征召,以在民间讲学为己任。“证人书院”就是他播道和传经的主要场所。

宁波市有处“白云庄”,原是《明史》编纂者万斯同家的别业。白云庄奠基人万邦孚的儿子万泰,与黄宗羲有几十年的交情。他们曾同拜戴山学派首领刘宗周为师,一同参加过复社活动,抗清复明,每年见面多次,交往频繁。万泰推崇黄的学术理论,断言“今日学术

下。即使是这样的新闻,也没有人敢怀疑它的真实性。”在《十年浩劫中欲哭无泪的一些细节》这一章,他直言不讳:“许多普通人对待‘文革’的态度和行为,说来真是毛骨悚然,惊出一身冷汗。谁是制造十年浩劫的罪魁祸首?——有客观需要,也有社会基础,不止是林彪,不止是‘四人帮’,不止是某一个人,应该看到更深层的原因。”这个更深层的原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述,但作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似乎还待深入一步,只有人民走出混沌,走向理性,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我不知这本书封面的引言是否编辑写的,如果是,愿向这位编辑的准确表达表示敬意,并录于此,为张先生的《故事新闻》再做一次免费广告:“在这本回忆录中,作者以见证人的身份,参与者的心路历程,叙述了大量亲历的细节,将当时自己的思想,感受给人以亲临历史的

感觉,给人近乎触摸的真实,能引起广大读者很大的思想共鸣。作者在貌似平静的记录文字下面,埋藏着对社会深深的忧患和对正义的热切呼唤,这一切都是这部回忆录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回忆录的最可贵、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俗话说,一叶知秋,读“一张”的回忆录,亦可知史。

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明季结社盛行,万泰的几个子侄曾组成“文业会”,与另一些人组成的“澹园会”,于康熙四年(1665)合并成立“策论之会”,并专程到余姚向黄宗羲请谒受业,由此揭开黄赴甬大规模讲学的序幕。两年后,黄正式从余姚来到宁波,“策论之会”又改名为“证人之会”,因为先师刘宗周在绍兴早就用过“证人书院”这个名

字。黄继承刘的衣钵,故将宁波诸处讲学之所也



高丽舞曲(韩国馆)

沈向然

童年的回忆,有时需要纪念品来佐证它的存在。大白兔奶糖唤醒的是副食品商店的年代,月票唤醒的是十六轮巨龙车的年代,回力牌球鞋唤醒的是广播体操的年代,那句著名的台词“上帝安排的”唤醒的则是译制片的年代。哦,当然还有主播辛宁醇厚的嗓音,那唤醒的是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年代。

“星广会”初始的年代,可不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5块钱的《音像世界》杂志和孙孟晋在“蓝调之夜”里的自言自语,是我除了写满自悟笔记的乐谱外,最可靠地了解西方音乐世界的途径和载体。John Coltrane 疯狂爆吐音的萨克斯和 Miles Davis 带弱音器凄厉的小号,仿佛要吹破半导体收音机小得可怜的喇叭。我躲在被窝里插上耳机,密集的音群比厚重的棉花胎更让我窒息。相比之下,那时的音乐会对于轻狂的叛逆少年而言,便如同一位打扮规矩行止温良的中学教师,隔周聆听几耳朵,便得以消弭自

己“不务正业”的罪过,其道德意义显然大于实际获得的快感。

音乐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定期播出,使它渐渐在我的生活中有了存在感,好像发育的青少年必须喝牛奶,从玻璃瓶喝到换包装的纸盒,但他也许根本一直就不喜欢牛奶的味道。后来“星广会”消失了一段时间,长达数年的沉默即使我偶尔会想念这个隔周周日上午播出的节目,正如同我们都会不经意地想起从前班里那一位很少讲过话的同窗一样。

“星广会”于我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对于每天八小时练琴的苦命孩子而言,隔周日的上午借收听广播之由,堂而皇之地体练半日,那绝对不失为一种以逸换劳的良策。我一面在父亲面前竭力装出因为没练琴而产生的惭愧与失落,一面又煞有介事地与他讨论该期节目曲

金岳霖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等,构成了他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体系,可说是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人们的印象中,金岳霖不治经济,不善理财,金岳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一再说过没有学过经济学。

实际上,追究起来,他的经济学根底还是很扎实的。金岳霖在海外求学经历,主要有两段时间,一是1914年至1920年留学美国,二是1922年底至1925年在欧洲的游学。先说美国,从清华学堂毕业后,金岳霖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科,他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写什么,没有看到材料,但想必与经济学有关。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经济学没有一点兴趣,因此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可是硕士论文的题目,还是《州长的财政权》,这篇文章既是政治学的范畴,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范畴。直到1920年金岳霖写了《T.H.格林的政治学说》一文,才算转到政治学范畴,并以此文获哥大博士头衔。

金岳霖到欧洲游学是在1922年春,金的年谱统称他到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他已经得了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还有必要再留学?或许还是游历访学更贴切,那就类似于当下的访问学者。不仅如此,他沿途还考察各国经济状况,所写书信多有议论。那么,经费何来?为何兴趣全在哲学,仍一路考察欧美的经济社会情形?这两个问题令人费解,金岳霖本人从未说明,回忆金岳霖的文章也均未作过解释。

新发现的金岳霖书信写于1922年2月至同年9月,共计15封,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其中第一封注明时间为1922年2月16日,金岳霖已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他在函中说“霖此次之能入而复出求学者,全赖先生(周作民)赞助,在京时未曾面谢,深以为恨,现在既已离国,只得实心求学,求无负先生之期望。”原来金岳霖赴欧洲深造的经费,出自于周作民任总经理的金城银行。银行出钱资助,目的在储存人才以

统称为“甬上证人书院”。在他看来,“生平师友,皆在甬上”,“甬上多才,皆光明俊伟之士,足为吾薪火之寄”。

黄宗羲讲学重在“经世致用”,白云庄里有副对联:“一人好恶当止,万民忧乐为先”,点出了他讲学的宗旨和抱负。还有一副对联“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句子引自黄宗羲诗《送万季野北上》。万斯同(字季野)此次北上任务是编纂《明史稿》,黄宗羲把继承和发扬明代道统的历史责任,寄托于这个史学成绩最好的学生身上,临行前感叹“不知后会期何日?老泪纵横未肯稀!”可见其情之真。

目之难得、演出人马之强大,如若错过势必遗憾良久……这种欲擒故纵的谈判伎俩每每得手,而伴随着喇叭里旋律之外夹杂着的嘶嘶声,一台双卡座的三洋9994式录音机,半瓶拧不上盖子的草莓酱和盛开着茶叶的特大号搪瓷杯,便构成那些泛黄的记忆中周日上午的定格影像。

有一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小念书;上海歌剧院的林友声先生跑来找学校,要附小出三位学生与乐团合作,在“星广会”演出。当时选了我高一届的瘦高个于巍拉大提琴,选了瓷娃娃一样的孙萍拉小提琴,选了我弹钢琴。我那会儿演奏的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K.488。那次音乐会在电台播出,家里的三洋双卡录音机再次立下首功,父亲将电台放送的实况录音转录到卡带上,在亲友间传着听。这是我第

备将来使用。每年,金城银行董事会给予周作民的“交际费”在四万元左右,周就用这笔钱,资助年轻人和文化人。周对文化人尤其客气,在金城银行所藏档案中,看到梅兰芳出国访问演出,徐慕云写中国戏剧史,都得到过周作民的赞助。不过,许多情况下也有老总自掏腰包的。金城银行资助金岳霖的经费,是半年拨付一次,具体的资助数目尚不清楚。不过金的每封来函上,周都阅过签字,仔细保存在金城银行的案卷里。

周作民既资助金岳霖赴欧深造,作为银行家总有回报的想法。在金岳霖一头,也须要做点事情,才好心安理得拿这笔经费。因此金岳霖一路上,对欧美经济社会状况十分留意,并不时写信报告周作民,所存15封亲笔信,均是关于欧美经济社会的见闻和思索,显示出他极为优异的经济秉赋和见解,成为金岳霖经济思想的一个观照物。

细读这一组书信,金岳霖消息来源广泛,见解客观中立,要言不烦重点突出,且不时闪烁真知灼见,非对经济有研究者,实不能为之,确属他难得的人生片段,展现出一位更多的哲学家的形象。

上世纪30年代,金岳霖已经回国,中国哲学会成立,金岳霖是核心人物之一,大家却推他担任会计工作,而且连任了十几年,后人多有奇怪,不知为何要他担任此项工作,连一起参加哲学会的冯友兰先生也说:“推金岳霖做会计,大家奇怪,很有意思。”实际上其他哲学家们也不善理财,而金岳霖至少学过经济学,所以才会推他担任此项工作。

但金岳霖确实不善理财,他把哲学会的700多元经费折腾得所剩无几,准备自掏腰包予以赔偿。可见,金岳霖即使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那他一定也是“哲学”的经济学家,而后来他成为哲学家,也可以断定他一定不是“经济”哲学家。

编者按:一切历史的背后都有金融的影子,上海的发展更是与金融息息相关。今起推出《海上金融》专栏,从文化史角度演绎近代上海金融风云。

退迹集

齐铁偕

【镇江金山远眺】

借得谁家神笔力,
倚天泼出淋漓墨。
春风昨日过江东,
一夜山河全改色。

【早春】

时雪时霜宛转轮,
红花遍野草如茵。
江南三月孩儿脸,
雨后风前别有春。

【泛舟】

轻舟解缆溜涓涓,
山色清新野色鲜。

回顾来时云水路,

一湖霖雨细如烟。

【高邮湖古渡口】

古渡天涯过客情,
一腔春水落花争。

茫然四顾难寻见,
雾里先闻打桨声。

【对弈】

新月浸江透水明,
船舱半掩苇斜横。
举棋欲止忽长击,
敲落两三蛙鼓声。

【江秋村】

小庐昨夜寂无喧,
远望野河水抱门。
布谷声声春雨里,
绿杨不觉覆全村。



一次真实地参与电台广播音乐会,我的紧张和沾沾自喜,都在卡带的转动里一一记录。

再回到这个舞台,是7年前,我幸运地赢得人生的转折点。回国后在上海的第二场演出,就是登上“星广会”的台。经过多年的积累,“星广会”已经成为一个高品质、低票价的市民普及音乐会品牌。上午的音乐会虽说并不合喜欢昼伏夜出的我,但听众的热情令人感动。这些年,随着音乐会一度转为电视播出,使得更多关注古典音乐的普罗大众,有机会走近古典音乐的艺术殿堂。星广会在二十一世纪所作出的拓展与延伸,正使得它不再轻易沦为一个怀旧的专属名词,而磨砺出一个活跃在当下既平易近人、却又不同凡响的传奇经典。

为了享受音乐大餐,三十年来换了七八个收音机。请读明日专栏。

我与“星广会”